

蘇修文藝大事記

教学参考资料

供批判用

苏修文艺大事记

(1953年3月—1977年5月)

陆协新编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1978年1月

前 言

我们试编这本《苏修文艺大事记》，是想通过这种形式，提供资料，帮助读者了解苏联修正主义文艺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作为批判苏修文艺的参考。

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产物。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头子的修正主义集团大搞阴谋活动，逐步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在文学艺术领域，他们以“加强思想领导”为名，控制了文艺的领导权。赫鲁晓夫等苏修头目经常亲自出马召见作家、艺术家，连篇累牍地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报刊也不断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专论、社论，鼓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否定列宁关于文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鼓吹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原则作为文艺创作的思想基础；攻击和篡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方针，在反对“个人迷信”和“无冲突论”的幌子下，鼓吹“写真实”、“揭露阴暗面”，疯狂反对斯大林，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革新”和“非英雄化”的旗号下，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和写“普通人”。在作

家队伍方面，把一些本来就是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作家、反动诗人和反革命分子（如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等）捧出来，或加以美化，或为他们翻案；同时，又大力扶持了一批自称是“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产儿”的“第四代”作家，如叶甫图申科、阿克肖诺夫、沃兹涅辛斯基之流；对那些已经爬上高位，有影响而又愿意卖身投靠的人，如肖洛霍夫、西蒙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等，则特别加以青睐，赏以种种特权，倍加重用。

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文艺界的这一系列倒行逆施，引起了苏联广大人民和文艺界一部分人的严重不满，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对此加以抵制和批判（本书收录了这方面的一些材料）。特别是1956年2月二十大后，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三和”路线和大反斯大林，引起了一股强大的国际反共浪潮，西欧各国共产党内和东欧各国形势动荡，10月爆发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国共产党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临这样的形势，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一个短时间内装出“反对修正主义”的样子，并在斯大林问题和某些理论问题上暂时有所收敛，同时还抛出几个作家（如杜金采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作“替罪羊”加以“批判”（本书也收录了这方面的一些材料）。但必须指出，即使在这个时期内，修正主义文艺作品和文艺观点，仍充斥着苏联文坛；到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修正主义文艺便更加畅通无阻地泛滥起来。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随着苏联向社会帝国主义的演变，在国内进一步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苏修文

艺发生了一些不同于赫鲁晓夫时期的变化。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虽然仍旧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但更强调文艺创作和评论的所谓“思想坚定性”、“党性”和“阶级标准”，反对“自由化”，以便从政治和思想上进一步控制文艺界，为其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服务；为了美化和粉饰法西斯统治的丑恶现实，鼓吹文艺要表现“劳动英雄主义”的题材，注意所谓的“新生事物”，反对揭露阴暗面；为了欺骗苏联人民，收罗侵略扩张的炮灰，鼓吹文艺要反映所谓“军事爱国主义”的题材，甚至不惜美化老沙皇的侵略扩张行径，炮制了大量的反华文艺作品；为了欺骗世界舆论、麻痹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掩盖其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野心，鼓吹文艺要写“缓和”题材。在作家队伍方面，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近几年来，由于苏联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苏修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在此情况下，苏联文艺界除了一大批御用作家外，还出现了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这些人中有的 是赫鲁晓夫为了大反斯大林而亲手扶植起来的反动作家（如索尔仁尼琴），有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狂热崇拜者。他们对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而采取的强化法西斯“纪律”和“法制”，不准揭露阴暗面，反对“自由化”等等一套路线和措施，十分不满，但又把它同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而加以反对；他们虽然也写了一些揭露苏修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和暴虐的作品，但同时也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共反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赤裸裸地鼓吹和追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和生活方

式。他们的活动虽然给苏修统治集团带来许多不利和困难，但是，他们同勃列日涅夫集团的矛盾，实际上仅仅是在建立什么样的资本—帝国主义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的所谓“不同政见”，实际上是苏修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人在统治方式方面的争论。由于这些人的活动深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视和赞赏，美国更是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与苏修争霸世界的有力工具，因而引起了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惊恐和不安，对他们采取了逮捕、流放、关进“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境等镇压措施。

此外，还有一些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苏修叛徒集团黑暗统治的作家，如柯切托夫、巴巴耶夫斯基等，他们以《十月》杂志为阵地，同以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代表的、以《新世界》杂志为中心的所谓“自由派”、“革新派”在某些原则问题上进行了斗争。勃列日涅夫集团根据自己统治目的的需要，有时对《新世界》的露骨的“自由主义”也“批评”几句（甚至还撤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对《十月》杂志也不放过，往往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力图加以调和，用以掩饰苏联文艺界的斗争。

本书主要收集1953年3月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到1977年5月这一时期内，苏修叛徒集团有关文艺问题的重要决议、措施；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修头目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苏修报刊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社论、专论和文章；苏修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有关苏修文艺的代表性作品的评论；苏修文艺界某些重要事态的评论和报道，以及某些文艺动态性的材料，等等。同时，为了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还记述了一些

重大政治事件的材料。

《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有关外国文学动态的内部刊物、《译文》和《世界文学》等杂志、1953年以后翻译出版的苏联文艺论著等。同时也参考了国内已有的关于苏修文艺大事记的材料（并作了一些核对订正）。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再注明出处。

本书是我系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供批判用。在引述苏修头目和苏修报刊言论时，本书一般未加分析批判。希读者在阅读和使用特别注意。由于水平和材料来源的限制，在编写和整理过程中，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一月

一九五三年

3月5日 晚上九点五十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共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逝世。

9月3日—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0月21日—25日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举行第十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召开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决议。

10月 《旗》杂志第十期刊登爱伦堡的《谈作家的的工作》。此文炮制于一九四八年，大肆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写“阴暗面”。

一九五四年

4月—10月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地纷纷召开作家代表大会和作家会议，讨论各共和国和各地方文学的状况和任务，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和出席全苏作协“二大”的代表。

5月 爱伦堡发表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攻击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污蔑斯大林时代为“冰冻时期”。〔按：第二部在1956年发表，把斯大林逝世说成是苏联社会的“春暖解冻”。〕

8月 肖洛霍夫开始发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中的一些篇章。首先在《星火》杂志第十五至十七期发表了第

二、三、四章，在第二十一期上发表第一章，以后陆续在不同报刊上发表其他各章。

9月 《旗》杂志九月号发表格·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通过刚从学校毕业的总农艺师娜斯嘉·柯夫莎娃同拖拉机站站长恰里科夫等人的“因循保守”、“自私自利”、“甘居中游”和“高枕无忧”的习气进行斗争、“改变农庄面貌”的故事，积极贯彻苏共一九五三年九月全会和本年一月二十八日赫鲁晓夫在全苏农业拖拉机站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的精神。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宣称：“关键在于干部，而且仅仅在于干部。这是提高农业、改进拖拉机站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缺乏知识修养的人担任拖拉机站的领导职务”，“有不少拖拉机站站长不称职”，“这样的人应当坚决撤换”，“今后的方针是：拖拉机站站长一般都必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其排斥大批原基层干部制造舆论。

11月11日 《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关于在居民中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说，“苏共中央搜集的事实证明：最近有些地方在对居民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时犯了粗暴的错误”。决议责成各级地方党组织坚决消除这些错误，并在今后“绝对不容许再次发生任何侮辱教徒和教会执事的感情以及用行政手段干涉教会活动的事情。”

12月13日 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苏共党和政府领导人同苏联作家会面。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波斯伯洛夫、夏塔林等参加了会见。

12月15日—26日 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

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七百三十八名。费定陪同年令最高的俄罗斯女作家奥尔迦·福尔什主持开幕式。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给大会的贺电。苏尔科夫代表作协理事会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和任务》的报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由一百三十四人组成的作协理事会和由二十九人组成的检查委员会。26日革拉特珂夫主持闭幕式并致闭幕词。28日举行第一次新选理事会议，选举了理事会主席团和书记处。主席团会议在法捷耶夫主持下，广泛讨论了工作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在今后几个月内的活动问题。书记处会议上选举苏尔科夫为苏联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

大会期间，爱伦堡、肖洛霍夫等人鼓吹修正主义文艺观点，并对法捷耶夫进行攻击。

爱伦堡在17日的发言中说：“把任何一部小说中的人物硬分成‘正面的’一类和‘反面的’一类的文学家，他们本身就是我们文学中的反面现象：他们身上还有很多旧社会的残余”。说“如今时代不同了”，“现在文学的的确确成了全民的财产”，对作家，“既不要把作家看成是不可侵犯的优秀分子阶层，也不要鞭打他们，如同旧社会里鞭打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他对会上有人批评《解冻》表示遗憾，说：“我知道在《解冻》里如同在我的其他作品里一样，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甚至有不到的地方。然而我要自责的，完全不是批评界所责备于我的。如果我还能写一部新书的话，那么我尽力使它比我最近这部中篇小说前进一步，而不是朝旁边走一步”。他还不指名地向法捷耶夫发起攻击，说“作家协会某一个书记的见解不应该被看成是能带来一切后

果的判决”。

肖洛霍夫在发言中借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攻击法捷耶夫，说“我们不能有也不应该有文学上的租界和享受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人”。

法捷耶夫在23日的发言中，强调“文学里的思想斗争还在继续进行，还有些势力在反对我们”，他说，“在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和毛病的时候”，“应该从热爱我们的共同事业出发”，如果“把批评的火力完全集中在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的那些方面的生活，而且作这种批评的时候极尽鞭挞的能事”，那他就“给敌人留下了混到他那里去的空子”，在这个问题上，他点了肖洛霍夫的名，说，“我也可以拿这些话来对他说”，认为“他却用他的发言来作人身攻击，——这是不严肃的”。

会议于25日讨论和通过了新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新章程删去了原章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一段话：“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一 九 五 五 年

5月24日 肖洛霍夫五十岁生日，苏联政府授予他一枚列宁勋章。苏作协理事会在贺信中称他是“伟大人民的儿子”，“是爱国主义的作家、人道主义者、为人类的和平幸福而奋斗的火热的战士”。

5月27日—31日 苏作家协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

“军事题材文学的发展问题”。会议由作协书记波列伏依主持。他在开幕词中说，“文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是配不上苏联武装力量的功绩的”，要求作家“描绘出苏联军人——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欧洲解放者的英雄形象”。同一天，《文学报》发表苏国防部总政治局付局长沙季洛夫中将的文章《巨大的崇高的主题》，他在谈到军事文学的缺点时说，“在现代战争中，突然进攻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可是有些作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6月 《哲学问题》杂志第六期刊登契尔特科夫的一篇文章：《苏维埃社会的一致性和新旧间的斗争》。说什么“自从我们社会中的敌对阶级消失以后，各个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对立也就消失了”。现在，在苏联“所表现的对立就是我们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中的新东西和旧东西的对立”。

“社会主义的特征并不在于我们矛盾的各个方面或相互矛盾的各种倾向的要素不是对立面，而是在于这些对立面并不带有对抗的性质”。鼓吹“我们没有阶级对立”，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抗性的关系”。

7月 苏《外国文学》杂志创刊。

8月 《外国文学》第二期发表肖洛霍夫给编辑部的信。信中说，为了“国际文化交流”和“苏联作家和外国作家广泛地交流创作经验”，“世界各国作家应该有一张元桌”。说什么“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一个造福人类的愿望会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鼓吹搞意识形态的“统一战线”。

9月 苏科学院主席团举行会议，批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认为该所“还没有成为苏联文艺科学的

真正中心”，“苏共中央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所指出的文学研究的落后现象，该所应负大部分责任”，“不大参加研究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的迫切问题，没有积极参与文学方面的思想斗争（例如没有反对《新世界》杂志所刊载的在思想上有害的文章）”等等。指出该所“科学研究工作的方向应该是”：“研究苏维埃多民族文学的经验”，“具体地历史地阐明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意义”，“把关于欧洲文学和亚洲文学的联系以及有关拉丁美洲文学，特别是现代东方国家文学（中国、印度、日本、阿拉伯国家）的研究工作，列入长期规划”等等。

10月6日 苏作协在莫斯科举行盛大晚会，纪念1925年自杀的“苏联诗人”谢尔盖·叶赛宁。谢尔巴巧夫在开会词中吹嘘叶赛宁充满颓废没落情绪的诗“对于我们苏联人来说是很珍贵的。这些诗还将获得许多代、许多代人们的珍爱”。席林斯基说，“对祖国的爱乃是诗人灵感的源泉和创作的动力”。他说，虽然叶赛宁存在“思想矛盾”，“‘光明’与‘黑暗’在他心灵上的痛苦的纠缠”，但是这“并没有淹没苏联人在叶赛宁的诗中所发现的珍贵的东西——真诚与深挚的热心、丰富与细致的感情”。

10月21日 莫斯科国立文学博物馆和中央作家俱乐部分别举行晚会，纪念资产阶级作家伊·蒲宁。同时，拉丁斯基等人发表文章，吹捧蒲宁“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革命后虽然长期住在国外而且死在国外，但晚年仍然怀念祖国”，“蒲宁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应该属于俄罗斯人民，属于俄罗斯文学”。

10月26日—31日 苏作协召开全苏作家会议，讨论“集

体农庄乡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会议由作协理事会书记斯米尔诺夫主持。他在开幕词中首先吹捧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若干章，说它“是近年来苏联文学的新的收获”。他说，“全体苏联作家的任务是创造广大的、完整的、综合的生活图景，把苏联现实的最本质的方面整个地表现出来”。华·奥维奇金在《集体农庄乡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强调说，“当前的集体农庄乡村中干部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文学作品应该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他要求作家“为了彻底实现党中央关于农业的决议，必须继续奋斗”，同时对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提出批评，认为“其中有着虚构和杜撰的成分，而和真正的生活不相干”，说主人公单枪匹马地干，“完全没有生活的逻辑”，但又说“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篇小说是个无冲突的作品”。

杰明季耶夫在发言中指出，“文学作品中还没有铲除粉饰现实的倾向”。

10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四期全文发表了莫洛托夫给该刊编辑部的一封信，说：“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我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在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说法。在这个报告中谈到：‘和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苏联一道，还有朝着社会主义采取了只是初步的然而十分重要的步骤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这种错误的说法导致一种不正确的推论，好象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只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石”，他说，这一“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造成思想问题上的混

乱”。〔按：后来，赫鲁晓夫将这一“说法”作为罪状，把莫洛托夫搞下台去。〕

1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八期发表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认为“近年来，在文学和艺术工作者中间传播着某些对艺术创作中的典型问题的烦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指责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总结报告中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一段话。〔按：马林科夫在这个报告中强调“必须通过正面的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光辉灿烂的人格”，以此帮助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他说，文艺工作者“必须时刻记住，具有典型性的不仅是最常见的事物，而且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着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

“对形象的有意识的夸张和突出的夸张，并不排斥典型，而是更加充分地表现它和强调它”。“典型性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问题。”〕文章指责说：“这种定义是片面的和不完全的”，“这个烦琐哲学的公式促使创作工作者去给一般原理作例证，而不去进行艺术上的发现”。文章认为，“使典型同普遍大量脱节，把典型同普遍大量对立起来，把典型变成独特——这就是要大家不去创造现实的人物，而去创造假想的、做作的和蹩高跷的人物”。文章在指责典型性总是和政治性、党性相联系的观点时说：“不能把文学和艺术的党性概念的历史具体的内容简单化地、烦琐哲学地同一切时代和一切艺术家所采用的典型化联系在一起”，“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党性是同主观主义的一切表现格格不入的，是同把人物变成思想的简单传声筒，把不适合人物性格的思想和感情强加在人物身上的这种作法格格不入的”，“是同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格格不入的，是同均等主义和公式主义格格不

入的”。

年底 苏联科学院文学和语言学部举行工作总结大会。学部院士秘书维诺格拉多夫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报告着重指出苏联文艺学的“落后状态”。他说：近几年来，在文学的典型问题、讽刺问题的研究上，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学说适用于文学过程的研究上，都带有“片面性和机械性”，并且很少注意“研究俄罗斯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问题、古代俄罗斯文学与斯拉夫系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作用问题。”不少著作“不是犯折衷主义的毛病，就是缺乏深刻的概括”；许多著作虽有理论的概括，而由于“事实根据不足和论述的教条主义”，也就“失掉了科学的认识作用”。他说，“文学理论仍然是文艺学最落后的一个方面”，“科学的文艺学术语极不稳定，极不统一”。

一九五六年

1月1日 《文学报》发表记者留方诺夫的报道，引用肖洛霍夫的话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已经接近完成，写好的一部分还需要作一些加工，今年上半年可以交出来排印。今年秋天，他将继续写《他们为祖国而战》第一部的结束部分。

2月14日—25日 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报告中强调“必须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

革命理论”。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大谈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就这个问题在25日下午作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在大会进行期间，莫斯科的作家在文学工作者中央俱乐部举行大会。二十大代表苏尔科夫首先发言，他说：“这些日子，在大克里姆林宫中感到真正的、深远的人类幸福，在那里大家充满了伟大的‘明天’的感觉。在这些从未有过的日子里，你会明白作家应当在哪儿发出更强大的声音，作家应当更接近自己的人民，更深入地发现和理解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

3月19日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东方文学讲座”的选题问题。科学院通讯院士康拉德在发言中说：“必须编辑多卷本的世界文学史”。认为“批判地研究东方各族人民的文学发展过程的时候已经到来了，首先应该研究的是东方各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问题”。他反对把东方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公式化，反对“按照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发展过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来划分东方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他说，当前的任务“是要研究东方文学的诗歌和古典作品的技巧”。里甫丁在发言中认为，“中国诗学的叠韵法可以丰富其他民族的文学”。

4月5日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此后，十月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发生，12月29日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重要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